

# 评容闳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郝宇青

中国近代史,是落后、挨打的历史,这在现代国人的心灵中还蒙着阴影。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近代史的另一面:中国人在落后挨打中,不得不把那顶“天朝大国的帽子”摘掉,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文化,并努力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向西方学习并致力于中国近代化的有识之士,象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薛福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在我们谈到努力向西方学习,并努力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人当中,不应该忘记另一个人,那就是容闳。

容闳,字纯甫,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28年生于澳门,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以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回国,怀抱“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引自《西学东渐记》,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书。)的伟大理想,开始了他的改造中国,使中国走向近代化道路的艰难生涯。可以说,容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创始人。(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他的一生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整个历史时期,卷入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某些反清武装斗争。1902年因清政府严令通缉,被迫逃往美国避难,1912年客死美国。

容氏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始终没有突破改良主义境界。而清末中国的一切近代化事业,却都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洋务派和改良派办过的种种“新政”中,几乎都注有他作为设计师的心血。他的一生,是第一代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中国近代化而努力的一生,值得后人纪念。

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容氏在推进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 一、努力促成西学东渐

中国的近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但在刚开始近代化的过程中,却是与学习西方文明紧密相关的。中国放弃“夜郎自大”的观念和封闭的内倾性质的民族性格,并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与西学东渐的影响分不开的。而容闳则是促成西学东渐的杰出代表。

容闳在西学东渐中的历史地位是公认的。1915年,恽铁樵和徐凤石把容闳用英文写成的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节译成中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取了个《西学东渐记》的书名,显然,这个书名并不忠实原文,却一直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就可说明问题。

容闳大力推进西学东渐，而其本身之所以能于早年入学，并赴美留学，就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努力推进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容闳最早的眼光是放在教育上。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就认识到了这一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也在他脑中生根。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教育之境”。这种知识分子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立志要为发展中国近代教育而努力。而容闳在促成西学东渐方面的主要功绩，就是实施他的教育计划。教育计划的实施是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性一步。他也认为，“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容闳的教育计划是在他向清政府上的条陈中提出来的。主要内容有“一、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二、选派新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三、开发矿产，以尽地利；四、禁止外国教会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个条陈涉及到除教育以外的其它方面的一些主张，但容氏认为，“此条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容闳把选派青年出国留学，为政府、国家培育人才，作为主要的事情来对待，是有原因的。他在美留学期间，看到科技的发展与运用，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认为都是文明的力度与作用，而改变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政治、经济、文化落后之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展教育，造就千百个像他那样留学知识分子，“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由他们担当起改变中国落后的命运。为此，他建议：先以一百二十名留学生作为实验，每年派三十人，四年完成，十二至十四岁的男孩学习十五年；派几个汉语教习为学生教汉文，在美国设立留美事务所设正副监督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从海关收入中指拨一定的经费。经过容闳颇费周折的努力，这个计划终于实现了。从1872年到1875年，先后四批百二十名学生，全部赴美。这在我国教育史上，由政府正式向外派留学生，尚属首次。而“政府之所以有此举，则完全于容闳一人之力”。（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一章。）

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科技，发展社会经济，对封建的传统旧学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愚昧统治是一次剧烈的冲击，这一举动也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制度的挑战。清廷中的顽固派，不仅竭力反对选派青年出国留学，而且对留学生造谣中伤，胡说留学外洋是“离经叛道之举”，“他日纵能学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和破坏，容氏据理力争，也终无效，留学生于1881年分三批回国，留学生的学业半途而废。留学事务所亦同时撤销。容氏筹划、实施多年的留学计划就此夭折。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在当时对此发出感慨：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极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

容闳促成的这项前所未有的留学生计划，虽然夭折，学生学业未竟，但他们毕竟受过近代新教育，掌握了一定的近代科学知识，成为不同于封建主义书蠹的“可用之才”。因此，他们回国后对推动我国的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动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一百二十名留美学生中，出现了一些著名人物；如中国铁路工程之父詹天佑，第一次不假

外力，修成了京张铁路；吴应科在甲午海战中表现英勇，获得了“巴图鲁”的荣誉称号；蔡廷干所译的唐诗，即《Chinese poem in English Rhyme》一书，至今仍为英美流行的唐诗译本；梁敦彦在清末当了外务部尚书；唐绍仪在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李鸿章在当时也认为：“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学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值此理；……李鸿章在当时也认为：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学以国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值此风气初开，确有成效”。“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洋务运动》）。

后来清政府把派遣留学生定为国策，作为挽救其腐朽政权的一种手段。爱国青年，也把留学当做寻求救国真理的重要途径，纷纷泛海远游，出国留学，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掀起了向外国学习的热潮，这对于引进外国先进经验和理论，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促进中国近代化有着巨大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学热潮的蓬勃兴起，推其源，容闳首倡其例，当年披荆斩棘之功，自然应受到称颂。

## 二、实业救国理想的实施

容闳探索中国近代化的另一途径，就是走工业近代化的道路。他为工业近代化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他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建成，这件事和他促成派遣百二十名学生出国并称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两件事。

容闳在国内并无显赫的社会地位，要实现他的改造中国的理想，在当时十分顽固保守的中国社会，并非一桩易事。他试图在中国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寻找最有利的和比较通畅的途径，即“识达官，以行其志”。《西学东渐记》中记述了他与曾国藩、丁日昌等洋务派官僚相识的经历。容闳能和洋务派官僚建立关系，是由于有李善兰、华蘅芳等科技家的推荐。在与曾、丁等人接触后，容氏对洋务运动抱着积极态度，并为之作了一定程度的努力。他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一个途径，可以变贫穷落后之中国为文明富强之新中国。虽然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实质上只是“盗取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严复语，见《救亡决论》），只是利用西方的一些技术皮毛，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根本无意于近代化，但在客观上，中国近代化还是由此迈开了艰难的步伐，这与容闳的努力相关。

1863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计划建造一“西式机器厂”（兵工厂），并向欧美购买大批设备，此时，容闳成为办理购买设备事宜的合适人选。容闳企图以此为契机，为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道路，从而提出了建设中国“机械化体系”的方案。他认为，“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遍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指制造枪炮）。所谓立普遍基础者，无它，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显然，容闳意图通过购买西方的机器设备，为全面建立近代工业体系打下底子。

容闳出色地完成了购买机器的任务，从而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兵工厂，即江南制造总局在1865—1867年的全部建成。此局还附设“兵工学校”，专门培养本国工程技术人员，以摆脱对于外国的依赖；又附设翻译馆，广延中外科技家，翻译西方科技

书籍,引进西方科技成果,以改进中国的生产技术。这些属于近代化范畴的措施,几乎都是容闳建议之下,由曾国藩、李鸿章等“达官”奏明清政府实行的。容闳对于近代化的努力和推进,其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我们能不能以容闳和曾、李有关,参与洋务运动,就说他属于洋务派呢?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从指导思想和具体行动上看,容闳和洋务派格格不入。洋务派办洋务是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维护飘摇于风雨中的清政府为目的。而容闳不仅要“西学”为用,而且还力图按照西方模式来改造中国,他所提倡的西学并非仅指物质范围的先进技术,还涉及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思想。这突出地反映出其思想的先进性,其目的是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容闳作为一个近代的知识分子,经济上的不独立,导致其人格上的依赖性,导致其对洋务派官僚的妥协性。为了实现他个人改造中国的计划,没有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容闳也不得不走“识达官行其志”的一条曲折道路,但不能就此说容闳属于洋务派。

容闳在接受西方文明方面是比较彻底的,美国的《人权宣言》和《黑奴解放宣言》在他心目中有着至高无尚的位置。然而,当他怀着赤子之心回到中国,立志改造中国之时,却是如是之艰,国民的劣根性、官场的黑暗、传统道德的封建性,使他无可奈何,要改造中国,只有妥协,于妥协之中求发展。我们不得不为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理想追求和现实努力中的困境而悲哀。

要实现工业近代化,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单单发展工业是不行的,要真正步入近代化的轨道,还必须有发达的交通、雄厚的银行。所以容闳在1896年和1898年,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创立国家银行和铁路公司,以及建造津镇铁路计划。他向清政府提出条陈,论述建造津镇铁路的必要性,认为该铁路“为南北往来孔道,必宜专筑一路,以为便民利兴之图”。(光绪朝《东华录》(四),总4040页。)这两项计划均由于清廷的腐败而没有任何结果,“尊至太后,贱及吏胥,无一不贿赂”,“吾人亡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容闳对中国近代化的努力应该充分肯定,但是从他的努力中,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改变腐朽的封建制度,任何发展中国经济的计划都不可能实现。

### 三、政治上提出民主要求以维新中国

容闳在政治上致力于近代民主,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在他的一系列改造中国的实践失败之后。他介入了太平天国运动,介入了洋务运动,实施了他的教育计划,然而均未果。容氏从这些实际经历中,尤其是教育计划的失败,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现状,仅仅发展实业,改变教育制度,是不可能使祖国达到繁荣富强之境的,因此,“中国根本上的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这是一个极其可贵的认识。要建设近代化国家,教育是重要的,发展工业及其辅助性产业是重要的,但是,若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改造中国的计划就不可能施行,即使施行了,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清政府的失望使他产生了为清朝实行根本变革的想法,最后走上维新道路是必然的结果,这一过程也可认为是容闳思想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

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西方政治观念的影响，“颇有归国建造中华之想”，并以西方政治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然而，1855年他一入国门，就接触到两广总督叶名琛镇压天地会起义，残杀七万余人的罪恶现实。这激起他无比义愤，使他痛切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为正当”，他一度产生“欲起而为之（指太平天国）响应”的念头。所以，1860年11月，他利用为英商采购丝茶的机会，访问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借此机会他向天王提出了一个使中国近代化的全面改革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幻想中国及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以遂他“维新中国”的宿愿。

容闳此时把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领袖身上。然而，当时太平天国已处于困难阶段，对敌武装斗争成为高于一切的当务之急，也由于太平天国的阶级局限，致使容闳的建议不可能实行。由此，他对太平天国的前途产生怀疑，认为太平天国“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实未敢信其必成”。

容闳对太平天国的建议未能实行，而他依靠洋务派实现中国近代化的理想也随着教育计划的失败而破灭。中日甲午海战强加于中国的悲惨命运，虽然使他幻想游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负责起挽救民族危机的使命，但徒劳无功。这些都促使他认识到，“中国根本上的变革”即实行政治上的革命，已成为“不容稍缓之事”。为了解决祖国的存亡问题，使他加入到了方兴未艾的维新运动当中。

容闳对光绪帝寄予无穷的希望，期待这个年轻君主能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实现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他说：“光绪当亲政后，颇思革新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其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王也。”这里对光绪帝的称赞有些夸大，却可说明容氏希望通过光绪以实现立宪的理想。

戊戌政变时，容闳因曾将其在京寓所供给维新人士作为会议场所，而被认为有“隐匿维新党人之嫌”，不得不逃出京城，先赴上海而后转香港避难。当在上海时，他仍热心变法维新事业，慨然纠合同志，发展组织“中国强学会”，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

1900年，容闳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张园国会”，与会者有各地维新代表人物数百人，公推容闳为会长。他还为自立会起义起草了英文对外宣言，其大意是：“决定不承认满州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政权必将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以伸张乐于全世界，端在树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利与之人民。”（参见《唐才常烈士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p277。）1902年他还参与了“大明顺天国”起义即“王寅广州起义”前的秘密活动。这些都证明容闳已从竭力于中国近代化经济建设转入政治斗争的行列，他的政治立场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从思想上和满清政府决裂。

容闳的这种“叛逆”行动，被清政府认为是“谋乱之头目”，应予以就地“正法”。（光绪朝《东华录》（四），总4574页。）1902年，容闳不得不去美避难，以到终老。

就是到了美国以后，他仍然关注着祖国的一切变化，其爱国之情未减，希望中国走向一个政治上民主化、经济上现代化的理想依然萦绕在他的心头。一个被清政府抛弃了的爱国知识分子，虽身在海外，然而仍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着国家、民族的振兴，这种精神怎能不令人为之感动呢？

## 四、结语

容闳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称其为悲，是因为他怀抱改造中国的近代化理想，方图报效祖国，然而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现实，导致国民的盲目排外心理，把西学笼而统之地和殖民者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混为一谈，清政府的封建性、腐朽性，也为近代化的传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只能产生令这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失望的结果：他一生满腔激情，最后却落个避难于美，并客死于美的悲惨结局；称其为壮，因为他的一生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上书太平天国、参与洋务运动、实施教育计划，最后加入到了维新派的行列，其思想的历程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提高，近代化蓝图的设计与实施无处不有容氏的影响。这些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革，促进了人们对合理化的民主政治的追求，痛恨违反人性的专制统治和伦理道德，为后来的社会革命起到了催苗助长的作用。

有人认为容闳一生一事无成的原因，就在于他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个后盾，而一味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封建当权者身上。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我们不能单纯地因为容闳认为人民群众的无知识，就简单地得出脱离人民群众的结论。当年容闳上书太平军，是他到天京一路上体察民情的结果。容闳确实有着“识达官，行其志”的思想，但在当时落后保守的氛围之下，向当权者作出一定程度上的妥协，是情有可原的。一个近代知识分子为了使中国近代化，却使自己的部分人格受到屈辱，仅这一点，我们就足以仰视容闳了。何况，我们评价一个人也不能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人物。

容闳所献身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事业，这在当时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在容闳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改造中国，发展中国，使中国近代化，使中国走向世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在那样一个过渡时期里，他充当了急先锋。容闳和其他先进的近代知识分子一起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在今天，我们要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同样需要千百万个急先锋涌现出来，抛弃一切陈旧观念，以现代人应有的全新姿态汇入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

容闳已矣，但其精神犹在。我觉得容闳为了推进中国近代化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可以用龚自珍的一句话来概括：“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启迪呢？